

浙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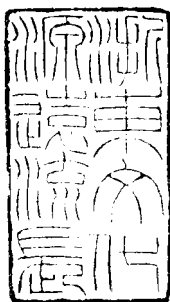
河姆渡遺址

1995 · 2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胡文明

封底篆刻:高式熊



浙东文化

1995年第2期

1995年10月出版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
《浙东文化》编辑部

编

印刷:浙江鄞县文教印刷一厂

主 编:李克西

发行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
订阅:馆学会秘书处

宁波市文化局文物处

执行主编:董贻安

(宁波市永丰路32号,邮编:315010)

内部报刊准印证

(浙)字第02-1062号

目 录

名城研究

从历史走向文化

——《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丛书》总序

周时奋(1)

宁波史前文化研讨会论文选辑

宁绍地区良渚文化初探

林士民(8)

河姆渡出土文物与宁波海洋文化

黄浙苏(16)

试述浙东出土的新石器舟船遗物及相关的问题

虞浩旭(27)

河姆渡陶文化研究

李 军(34)

说釜——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

文化发现的釜看釜的演变

章 玲(44)

宁波地区出土的史前木器初探

晓 荷(50)

浅谈慈湖遗址

章国庆(63)

论鸟在河姆渡

施祖青(67)

河姆渡遗址

袁尧明(75)

余姚河姆渡遗址为姚墟说之补正

邵九华(77)

古籍与文献

天一阁藏书出版史上的盛举

骆兆平(79)

考古新发现

象山明代沉船发掘简况

丁友甫(86)

浙东文化家族

汉唐余姚虞氏世家述略

蓝溪子(88)

文物管理

试谈当前文物经营中的营销策略及其运用

翁平娜(103)

浅析文物干部外流现象成因与对策

周长桥(110)

学术动态

宁波市举行史前文化研讨会

(115)

宁波市文博系统首届优秀学术成果评奖揭晓

(116)

中国明式家具学会会长陈增弼教授莅甬讲学

(119)

出版消息

《甬上工巧拾萃》即将出版

(118)

《天一阁丛谈》1996 年将重版

(119)

象山明代沉船发掘出土现状辑录(部分) (封 2)

青花人物瓷笛(清·光绪) (封 3)

致读者

责任编辑、校对: 励凤霖

从历史走向文化

——《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丛书》总序

· 周时奋 ·

(一)

公元401年，东晋王朝的一支小小的海防部队选择浙东三条大江的汇合处，建立了一个要塞，它的任务是扼守大浹江（甬江）以防止孙恩农民军的进攻。海防军用树枝条和泥土筑起的工事当时完全用于军事防卫，但它却成为今天中国东部的一个著名港口城市宁波的第一堵城墙。这道被称为“墙”的工事完成了平原与岛型城市的分野，宁波城就这样奠基了。组织这个工程的那个晋王朝军队基层指挥官从这里发祥他的事业，他以后就成了中国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宋武帝刘裕。

宁波城处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上。东部的天台山和西部的会稽、四明两山以及北部的海岸线，在浙江的最东面围合起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水系，余姚江和奉化江穿过各自狭长的山谷平原在广袤的中部水网平原腹地交汇成入海的甬江，这一特殊的地理骨架规定了宁波地域发展富有个性的方向和脉络。

大约距今7000年前，在全新世第四次海侵后的海退中，今甬江流域的平原部分逐步从山麓向海岸生成，于是在最先成陆的山脚线一带，成为新石器时代先民们活动的舞台。在有清澈的溪水流泻的山口，今天的人们常常会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存，而平原的

腹地无一例外地找不到上述的痕迹。今天的宁波城恰恰属于例外，城西南郊在当时估计是浅海、滩涂和沼泽包围起来的一片高地，先民照例在这里刻下了他们生存的记痕。著名的河姆渡遗址揭示了这一阶段地域社会丰富的内涵，它不但以稻作和耜耕农业、黑陶和干栏式建筑成为它独特的文化个性，而且以它距今 7000 年的时间座标，证明这里是中华民族发祥的源头之一，成为长江流域早期人类社会老资格的代表。河姆渡文化不是孤立的典型，作为宁波城文化环境的整个甬江流域，已多处发现它的存在。

河姆渡人最终在浙东形成了于越民族。“餐稻羹鱼”的饮食特点和“以舟作马”的交通方式以及他们特有的工具“戊”，使这一支先民在黄河流域人的眼里成为奇异的一族。越人并不安份于自己既有的土地，他们要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争取他们的发言权，他们以农业经济的实力和先进的青铜冶炼术为后盾，越过太湖参加了中原逐鹿，并一度称霸。这时候，在他们的后方基地甬江流域，傍山面海鼎立起三个庞大的聚落，以至在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立刻在这里形成三个县的建置：鄞、鄮和句章，它们是形成日后宁波城的母体。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宁波城市的形成还有一段漫长的孕育历史。这段历史大约持续了一千年，其间将越过如下的几个里程碑：除了公元 401 年三江口建立军事要塞外，经过公元 589 年三县合一、738 年在宁波西部山麓的小溪建立明州到 771 年鄮县治由小溪迁到三江口，821 年明州治迁到三江口并营建内城，且在唐末完成周长 18 里的罗城，最后奠定了古代宁波城市的空间形态。这段漫长历史的背后，并列的是宁波平原由滩涂、沼泽向灌溉式农田开拓的历史。其中有一戏剧性的插曲是，公元 621 年，唐王朝曾试探性地在三江口建立过一个短暂的州级政权“鄞州”，四年后突然消亡，待到整整 150 年后明州政权才正式登上这块土地。第一次建州失败的原因中应当包含这样一个基本因素：政治中心远距西部的经济腹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三江口建城是宁波平原开拓基本完成的标志。经济始终

是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海退在这片平原上留下众多的沼泽和湖泊，加之“越泥如玉之匭”，这种水土条件蕴育了中国最早的制瓷技术。以上林湖为代表的越窑青瓷，在公元9世纪前后达到了中国青瓷技术的最高水平。这里为皇家焙烧贡瓷的历史整整持续了三个世纪。越窑同时为后世的宁波城市史研究者送上一份珍贵的馈赠，因为青瓷研究的确是一个诱人的课题。

中国海岸线大致以长江口为界南北有明显的区别。北部多为泥质海岸，滩平岸阔；南部多为石质海岸，深港陡岸。适用的海船也因此南北有别，北船吃水浅而平底，南船吃水深而尖底。南北海运常需在长江口附近寻找一个转口港，当上海尚未兴起而杭州湾巨大的潮差缺少成港条件时，宁波显然是理想的转口地。何况宁波的内河船溯姚江而上正好沟通开掘于六朝的浙东运河，这条古运河在萧山的西兴越杭州湾可直通大运河，因此宁波实际上处于中国南北海运和内河航运主干线的交叉点上，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宁波从唐代起就成为中国著名的国际贸易港。作为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地，宁波借助港口荣膺了“海上陶瓷之路东方起点”的美誉。宁波港与日本、高丽、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荻源悠久的历史联系，为中国海交史树起了一块令人瞩目的里程碑，甚至在北宋的有一段时期，由于契丹的兴起，战争阻隔了北部的海陆通道，宁波城就成为中国与日本和高丽联系的唯一口岸。这种国际贸易与文化联系经过明代的勘合贸易和清中叶的“五口通商”一脉相承地延续到今天。

值得注意的是，宁波城市在南宋有一个质的飞跃。由于宋室南渡莫都杭州，宁波在骤然间由海疆鄙地变成了京畿樊篱。在不长的时间里，宁波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与北中国城市历经千年的发展史相媲美。王储遥领、丞相兼牧，宁波的政治社会缤纷多彩；官府·富户·农民的水利共同体完成了城郊灌溉控制体系；据《宋会要》记载，宁波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了全国之最；而就城市建设而言，我

们甚至可以看出，今天宁波中心区的城市骨架与布局，基本奠定于南宋。

然而“地狭人广”的人地矛盾一直困惑着宁波的经济，商业就在夹缝中应运而盛。即使在重本抑末的时代，宋王朝的尚书省仍专门批示，宁波的商人可以蠲免关卡的税收，因为商业确实成为宁波富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宁波城市作为“东南都会”的繁华，另一方面，宁波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大陆 400 毫米降水线以南的全部城市。繁忙的商务联系使宁波商人在明永乐年间首创了中国民间邮递业“信客”业；又在清中叶首创了金融业的“过帐”结算制度，从而揭开中国近代金融史的扉页。清咸丰年间前后，宁波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大量转入上海，成为上海城市早期开拓的一支最主要力量。宁波商人在上海形成民族资本的同时也在那里孳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畸型产业“买办”，一种畸型的外贸商和外贸中间商行业。

我们扼要地描述古代宁波社会发展的地方脉络，是为了从中领悟地域文化得以滋长的土壤，也为这套丛书的读者提供一个阅读的地方历史背景。

(二)

丰饶的物质之树必然开放出灿烂的精神之花。当宁波平原开拓尚处草昧之时，文化的接力首先由余姚城得到了第一棒。公元一世纪余姚首创甬江流域第一所学宫，作为教学直接成果的人才，余姚人在唐之前仅国史入传就有 22 名。这一期间余姚城最大的文化现象莫过于虞氏家族人才群落的出现，从后汉到初唐，这个文化家族历六个世纪而代有英才眩世，并有千余卷著作落成，上述 22 名国史入传者绝大多数出自这一家族，这是教学与文化的力量。因此在公元 1047 年，当年青的政治家王安石踏上宁波这片土地的时候，作为知县他的第一件政务决策就是在这座城市创办的一所县学。这一

决策对宁波文化的历史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宁波城的文化教学从一开始就呈现了两方面的特色。作为以科举为目标的官方教学,在它发轫不久就有“甬上第一状元”张孝祥名世,如果我们把这种科举考试作为全国性的同一起跑线的人才竞争,则能窥察到甬上教学的效率;而另一方面,私人讲学的书院又林立星布,书院的一方面功能是学术研究,著名的“庆历五先生”,“淳熙四先生”都既是学者又是教育家。科举教学在甬江流域产生了近 3000 名进士和 12 名状元,这在全国也不多见;而作为学术研究,宁波从儒林草昧时期就开始有较高层次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著述和思想成果。从南宋的杨简到明清的王阳明、黄宗羲延至清代的万斯同、全祖望,甬江流域就象一只巨大的文化摇篮哺育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浙东学派”,产生了一批中国早期民主主义的伟大启蒙者。

与这种文化教育现象相呼应的是甬上的藏书文化异帜独炽。藏书是读书活动的继续和积累。当时,在这座城市里“庠声序者,洋洋邹鲁”而在农村,则是“田家有子皆读书”,“邱版易经人一册”。这种浓烈的文化氛围,必然呼吁着文化积累。从南宋的“碧沚”到晚清的“烟屿楼”,宁波城涌现过一大批书富万卷的藏书名楼,它的影响所及,即使在偏僻的四明山心,也建树起如梁弄“五桂楼”这样的名书楼。因此“天一阁”的出现决非偶然现象,它是宁波士人历史文化责任感与宁波地方藏书经验的一次伟大的总结,也是对中国藏书文化的一项伟大贡献。

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折射,宗教是值得关心的主题。“越人好祀”的地方文化心理和越地民间的多神崇拜,为外来宗教的植根提供了丰腴的土壤。公元 282 年佛教传入宁波,首先在城郊山麓地带徘徊,但很快就进入草成规模的城市,并生根落脚。现存的天封塔和咸通塔都是佛教踏进城市的纪念碑。佛教在南宋起与民间崇拜分道扬镳。宁波是南宋士大夫的后花园。一方面,京城临安宁波士大夫参与中央政治形成“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的热烈场面;一方面,以

丰、楼、史、郑四大家庭为代表的士大夫在故乡倡导佛学，广种福田。带着玄学思辩和儒学注解的佛教禅宗被士大夫们心领神会，激扬发挥。“一花开五叶”的禅宗，几乎所有宗派都在宁波找到落脚之地，并代有高僧登堂入座。宁波成为中国禅宗的一大丛林。而民间的多神崇拜继续炽烈高扬，形成灿烂而荒诞的文化氛围。神、人、鬼构成的观念世界成为地方文明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在宁波，被物化的观念形态在工艺实践中的表现甚于纯艺术形态的生成。宁波号称“三金”的朱金木雕、泥金彩塑和金银绣品代表着宁波工匠以精细工巧，内涵丰实为特色的创造精神，而实际上，这种精神一以贯之地倾注在宁式家俱、服饰、饮食和建筑中。保国寺所表现的北宋江南庙堂建筑和建筑结构的典范性，至今依旧让后人赞叹不已。在这些实践形态的艺术趣味中，我们仍依稀能感悟到士大夫审美情趣的影响，我们只要细心地体味宁波的木雕、竹雕和水磨砖雕，就不难咀嚼出典雅含蓄、忧乐两兼的文人情趣。

(三)

一切历史都已过去，但历史又不断被当代人重新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又都是当代史。当历史的价值被当代的人们所重新认识和认同时，历史就获得了复活与升华，就嬗变成文化。因此从某种角度看，文化就是心灵的历史。

1986年12月，宁波这座古城以其灿烂悠久的历史，以其古代港口城市的典型性和它的富有特色的传统街区与文物建筑的现存性，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前人留给后人的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好好保护这份遗产并加以利用，这是当代人应有的历史责任。因此，当我们面对这座名城所要思考的是，如何弘扬它的历史精神，发掘它的历史价值，规划它的锦绣前程，这一切都是当代人的严肃又富有魅力的使命。

区域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崛起的一门富有辉煌前景的学科。这

门集多学科研究方法于一体的崭新学科,其探索的方向和主要学术精神完全可以为我们的名城研究所借鉴。市文化局和市文博学会计划编撰、出版的这套《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丛书》,就是旨在整理、辩证、发掘、研究以宁波城市历史为主体的甬江流域史的一项十分值得称颂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最后完成,可能要跨越到下一个世纪,而丛书的撰编者,又以宁波市的文博工作者为主体,他们将愿意大量地利用业余时间,精卫填海般地去完成这一跨世纪的文化工程。这件事其本身又是当代的可歌可泣的文化现象。人类文明的传递,总是不断地从历史走向文化,又以文化激励当代的过程。当我们的这项工作也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无悔地宣称,我们忠实于历史接力的使命。

(作者单位:宁波市文化局)

(清光绪)青花人物瓷笛 (封3)

此笛(见封3)系宁波市文物商店于70年代从民间征集。瓷笛长51厘米,外径2.8厘米,内径1.6厘米。瓷笛两头微微外撇,上置有12只圆孔,可以任意吹奏。胎体洗练精致,洁白细腻,瓷化程度高。通体青花装饰,自上至下用较浓重的青花料描绘神态各异的八仙人物,形象生动,他们舒展漫步于用淡描青花勾勒的山石树草之绝妙景色中,通过对远处高低起伏山石以及对人物树木的浓笔淡描,再两头配上层层排列的云幅、回纹和缨络纹边饰,使整个画面主题突出,富有层次,布局严谨,颇具匠心。显然,此瓷画意境清新幽雅,富有文人画的艺术境界,反映了当时景德镇瓷器精湛的技艺。

由于此瓷笛烧制工艺精致,又形体规整,青花色泽青翠,色调柔和,层次清晰,晶莹的白釉间隐约闪烁纤细工整波浪纹,此瓷笛实属罕见。

(翁平娜)

(编者按) 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宁波史前文化, 由于其蕴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涉及学科、研究领域的广泛性, 近20余年来, 一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执切关注。今年11月初, 宁波市文博学会专门召开“宁波史前文化研讨会”, 共收到来自本市文博界专业工作者撰写的论文达40余篇, 这些论文论题广泛, 涉及原始水上活动, 原始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原始艺术、原始宗教、原始历法等等, 标志着宁波地区史前文化研究队伍的形成和研究水平的深入。本期从中选择部分论文特设专辑予以刊登, 热忱期待专家、学者关心和教正。

宁绍地区良渚文化初探

· 林士民 ·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的一支土著文化, 是以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作为一种土著文化, 它绝非孤立, 有一定的分布地域, 它有自身特有的文化内涵, 当然在文化交融中相互渗透, 互相影响这是理所当然的。

长江中下游至今正式名命有大溪文化(四川巫山), 屈家岭文化(湖北屈家岭), 河姆渡文化(浙江余姚)。马家浜文化(浙江嘉兴), 良渚文化(浙江余杭), 崧泽文化(上海)和一度被称为的青莲岗文化(江苏), 其中浙江省就占了三个文化。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四周, 也就是说主要分布于浙江、江苏和上海市。这些地区通过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表明, 在文化遗物方面, 如陶器, 有鱼鳍形、T(丁)字形足鼎, 竹节形(缕孔)高足豆, 圈

足或瓦足盆(盘)。双鼻长颈壶,双鼻鲮形壶,尊形器,宽把带流杯,匝形器,流细颈觚等。在陶器(陶鼎或陶壶等)表面刻有细密繁复的图案形花纹。

生产工具中,石器有“犁形器”,斜柄石刀(有的学者称“破土器”还专门研究了它的按装,这类斜柄石刀出土时与食用切割的实物在一起,故有学者称它为“厨房用刀”)翼形石刀(有学者称“石耜冠”也有学者称为“耘田器”),“凤”形及有肩穿孔石钺,有段石镞等。

在用玉方面,更具特色,不仅出土数量之多,制作之精是惊人的。如璧、琮等礼仪性器物,在表面雕刻的神人兽面纹,则是这一文化独有的标志,以上种种构成了良渚文化独特的器物群。

根据目前正式发掘,经过 C14 测定的主要遗址有上海市松泽三期 M87 人骨,距今年代(树轮校正)为 5180 ± 140 年,以下均同,青浦福泉山炭化木, 5295 ± 110 年,青浦果园村四层木头, 4505 ± 145 年,金山亭林下层树干, 4200 ± 145 年,江苏省吴县张陵山木炭, 5785 ± 240 年,海安青墩树根, 5405 ± 110 年,木炭 5235 ± 135 年。浙江省吴兴钱山漾稻谷, 5260 ± 135 年,四层木杵, 5255 ± 130 年,三层千部, 4710 ± 140 年,四层竹绳, 4580 ± 135 年,余杭安溪四层木块, 4820 ± 180 年,嘉兴雀幕桥木井板, 4330 ± 145 年,德清辉山 M2 葬具, 4085 ± 120 年,[1][2]

从上述 C14 测定的年代,上海博物馆黄宣佩先生曾对良渚遗址的这些年代,作过具体而细致的研究,尤其对 5000 年以上的六个测定数据中的张陵山、福泉山和青墩的二个数据,不属于良渚文化。[3]从查阅原发表的报告表明,张陵山标本采自 M2 近旁的一块木炭,而“良渚文化的埋葬方式”,大都采用平地堆土掩埋或挖浅坑埋葬。如果墓地建在早期遗址之上,堆土或填土中常带有早期的遗物,张陵山的良渚墓地迭压在崧泽墓地之上,所以墓旁木炭有可能从下层翻上来的遗物。“青墩的二个标本,据《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出标本所处的地层,实际上包含良渚与崧

泽二个时期，出土的标本不一定属于良渚。”至于上海福泉山 T3 标本，已查明出于崧泽晚期地层。对于浙江钱山漾同是四层的遗物，木杵 5200 年以上，而竹绳只有 4580 年这样的差异也难以应用。

从测试标本年代看，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 4900—4100 年为妥，而 5100—4900 年这一段应为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也有学者提出这个过渡应从 5300 年开始。

从典型良渚文化的文化内涵与年代，再来看看宁绍地区良渚面貌与年代。

对宁绍地区调查、试掘、发掘的 90 余处遗址，作了细致的分类排比。第一类，属于河姆渡文化的 21 处。第二类，植根于河姆渡文化，其上为良渚文化的有 16 处。第三类，与河姆渡文化没有直接迭压关系的，属于良渚文化的遗址 17 处。第四类，属于史前文化遗存的文物点 40 余处。[4][5]

在上述统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宁绍地区已有 34 处属于良渚文化的遗址或有明确迭压关系的良渚文化地层。加上史前文化遗存的许多文物点属于良渚文化晚期遗存。现根据这些良渚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地层出土的遗物通过剖析研究，可以归纳如下几点：

第一，宁绍地区良渚文化，从遗址分布情况，可以清楚的看出分布范围在会稽山四明山以北，西临钱塘江，东达舟山群岛，东南到象山港南岸，西南伸入嵊县山区，遗址大多集中在宁绍山麓与平原交界处和钱塘江南岸古海岸线的丘陵地带。遗址群分布成波浪形向东西延伸。从几十处遗址标本排比实际情况反映了遗址较集中地区的年代较早，与河姆渡文化有一定的渊源。越向外延伸，年代相对较晚。

第二，宁绍地区良渚文化典型遗址与地层有：慈湖（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遗址上层，以泥质黑皮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器物组合以鼎、豆、罐为主。典型的有鱼鳍形足鼎，圈足浅腹盘，双鼻壶，宽耳杯和口沿饰针刺纹的罐。石器有镞、犁、耨（采集）等，C14 测定时

代为距今 5365 ± 125 年。[6]

妙山(宁波市江北区妙山)遗址上层,以黑皮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为主。主要器物为夹砂陶鱼鳍形足鼎,黑皮陶豆、泥质红陶豆、罐等。石器有通体磨光的有段石锛、石斧、石刀等。时代距今约为 5100 年左右。[7]

茗山后(奉化市茗山后)遗址晚期,夹炭、夹砂鱼鳍形足鼎、T 字形足鼎、圈足罐、泥质黑皮陶竹节把豆及泥质红陶圈足盘等。石器典型的有“耘田器”(石耜冠)、有段石锛、柳叶形石镞等。在墓葬中出 T 字形盆形鼎、素面釜、圈足盘和圈底钵。时代距今为 5465 ± 286 年与 5305 ± 90 年。[8]

塔山(象山县塔山)遗址中层,从陶色看也和慈湖遗址同,以泥质黑皮陶为多。鱼鳍形足盆形鼎 T 字形足鼎、圈足矮宽的豆,高瘦竹节把豆,双鼻壶、宽把杯、圈足盘。黑皮陶双鼻壶在第 5 文化层出 ± 5 件之多。此外还发现 2 件。石器有石耨、石犁“耘田器”,半月形双孔石刀,有段石锛和柳叶形镞等。时代距今约 5100 年左右。[9]

马鞍(绍兴县马鞍乡)遗址,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为大宗。装饰主要缕孔、附加堆纹。主要器物有豆、罐、盆、盘、壶、杯、瓮、鼎等。Y 形和鱼鳍形足鼎,大圈足盆和豆最具特色。石器有钺,耜冠(耘田器)、有段石锛、凿、刀、镞和玉管、铢、镯等。[10]

从这些典型遗址和其他遗址中所出土的器物,可以清楚的看出器物群中的陶器和石器基本面目。在这一地区 33 处遗址中,不管文化堆积有厚有薄,材料丰欠有别,但出土的遗物从种类到特征,基本雷同。从陶色看,以夹砂陶,泥质陶黑皮陶为主。常见的器物有鱼鳍形足、T 字形足鼎,竹节把豆,双鼻壶,圈足盘等。宽把杯,锥刺纹罐,夹砂缸形器在较多的遗址中都可找到它们的踪迹。在石器方面,三角形带孔石犁,石耨、耘田器(石耜冠),穿孔石刀,有段石锛,柳叶形石镞,风字形穿孔石斧(石钺),斜柄石刀(破土器或称厨房用刀),在各遗址中或多或少为常见之物。这些器物,可以从总体上看与典型良渚文化,陶器、石器的器物群十分相似,但有

的则有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一是它们时代的差别，二是区域的差异。

良渚文化用玉是典型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宁绍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有像典型良渚文化那样的玉器。过去在“肖山河庄蜀山发现良渚文化玉琮，”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是钱塘江改道与江北岸的地理环境有关。钱塘江以北，浙北及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不少玉器，而宁绍平原到目前公开发表材料看只有一座墓，而属于小墓，没有玉器随葬。遗址中也没有玉器的发现。这里有二种可能，一是没有发现，二是确实没有使用玉器，这方面要待今后考古发掘资料进一步证实。

与玉器一样，在余杭等地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祭台，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也是作为良渚文化中的一个特点来提，并分为“瑶山式”和“福泉山式”二类，这种“祭台”，具有祭祀和墓地两种功用。[11]而宁绍地区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祭台发现。奉化茗山后遗址发现的土台，但“台残存不多，土台上也无明确性状的遗迹发现，”[12]因此，还需要继续做工作，才能搞清它的作用与用途。

总之，用玉与“祭台”建筑遗迹在宁绍地区良渚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这里也可能今后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也有可能发现，另一方面宁绍地区良渚文化确与浙北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在用玉与祭台面貌不同或地域差别。

第三，宁绍地区良渚文化年代与河姆渡文化关系问题。在上面介绍几处典型的良渚文化遗址或典型良渚文化地层时已叙述了它们的距今年代，大多遗址或遗存地层的年代在 5100 年左右。这方面不但有 C14 测定的数据，而且也有具体对比的材料，因此 5300—4900 年这一段实际上是宁绍地区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

良渚文化遗址，如绍兴马鞍山遗址、仙人山遗址，上虞市五星村遗址、马慢桥遗址，余姚市茅湖遗址等等 17 处外，遗址直接迭压在河姆渡文化(4)(3)期文化上的有 16 处。如前面典型遗址中的慈湖、茗山后、塔山、妙山等等，就是说下层是河姆渡文化，上层为良

渚文化。

16处遗址中6处迭压在河姆渡(3)期文化之上,有10处直接迭压在河姆渡文化(4)期文化上(河姆渡文化,分期为(1)到(4)期文化,一脉相承),慈湖、妙山、茗山后、塔山等遗址,相当于河姆渡文化(3)期上迭压着良渚文化层,这说明文化层的直接迭压,并非意味着它们有直接继承关系,晚期文化并非都有早期文化演变发展而来。

河姆渡(4)期文化的年代经C14测定为距今5500—5000年,这就明显地可以看出,河姆渡(4)期文化之上,“大约在5100年左右时,在先进的因素促使下,产生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河姆渡文化终于被一种渐兴的良渚文化所代替。”与河姆渡文化没有直接迭压的文化遗址,从文化面貌和C14测试表明,大多为5100—4900年,这一段应为宁绍地区良渚文化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时期或称过渡阶段与河姆渡文化的(4)期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时期,只不过每个村落所处的地方不同而已。

也正由于它们发展的同步性,加上文化的具体交融与互相影响,因此有“部分器物在形态上有一定的承袭因素”。例如典型的鱼鳍形足鼎在河姆渡(3)期文化至(4)期文化的演变是最明显的。直到良渚文化时期,一脉相承。河姆渡(4)期文化釜上的绳纹装饰则在良渚文化时期的釜也存在。不过数量较为少。从总体上看,由河姆渡文化(3)(4)期的釜渐渐为鼎所代替。至于良渚文化地层中出现绳纹釜,而没有发现支座之类器物的存在。推测这类釜,并非明火的炊器,有的釜体量特别小,而出自墓葬,当为冥器,仅仅从釜与它的装饰而言,可以证明良渚文化与河姆渡时期文化在某些方面尚有一定的联系,部分器物在形态上存在着某种递进的承继关系,[13]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沉淀。

第四,宁绍地区良渚文化与浙北太湖四周的良渚文化的关系问题。良渚文化从目前研究成果表明,从考古地层关系上找到了直接迭压的地层。有的学者提出早晚两期,[14]有的学者提出早、